

宋前志怪小说中相术叙事之文化意蕴与艺术特色

张辟辟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1)

摘要: 相术宣扬命定论思想, 同时强调相德、相心的重要性, 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为志怪小说家所奉行。他们在小说中通过相术叙事不仅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观念, 更宣扬相德、相心先于相形的理念, 强化了作品的文化内涵, 显示出浓厚的相术文化意蕴。结局照应相术对人物命运的预言, 是相术叙事的基本模式。与命运有关联的身体部位或相关情节之描写, 由相术引出的出人意表的情节和对美德的褒赞来塑造人物, 增加了作品的形象性、生动性。概言之, 相术叙事有引起事由、设置悬念、铺展情节、描写人物、严密结构、深化主旨、引人入胜等多重作用。

关键词: 相术; 志怪小说; 相术叙事; 文化意蕴; 艺术特色

中图分类号: I207.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1)03-0168-06

关于相术, 有学者下过定义: “相学也称相术, 是通过观察人的身形、骨法、相貌、气色、皮纹等以测定人的性格、命运、福寿的方术。”^{[1](299)}宋前志怪小说中有包含相术叙事的作品, 其文化意蕴非常丰富, 叙事方法、策略也颇有特色, 本文对此作一些探讨, 以期引起大家的兴趣, 并借以向方家请教。

一、宋前志怪小说中相术所隐含的文化意蕴

相术是一种古老的方术, 它探究人的形貌与命运的关系历来受到思想家的重视。西汉初, 《淮南子·修务训》: “若夫尧眉八彩, 九窍通洞, 而公正无私, 一言而万民齐。舜二瞳子, 是谓重明, 作事成法, 出言成章。禹耳参漏, 是谓大通, 兴利除害, 疏河决江。文王四乳, 是谓大仁, 天下所归, 百姓所亲。皋陶马喙, 是谓至信, 决狱明白, 察于人情。”^{[2](1335-1336)}在人们看来这些古圣先贤杰出的才能, 与他们相貌的特异是紧密相连的。东汉建初四年(公元79年), 光武帝主持白虎观会议, 班固整理编辑成《白虎通德论》, 即《白虎通》, 这是当时经学的国家标准。其中列有十二位圣人的“异表”, 也强调了这一点。《白虎通·圣人》云: “圣人皆有异表。《传》曰: 伏羲日祿衡连珠, 大目山准龙状, 作《易》八卦以应枢。黄帝龙颜, 得天匡阳, 上法中宿, 取象文昌。颡项戴干, 是谓清明,

发节移度, 盖象招摇。帝啻骈齿, 上法月参, 康度成纪, 取理阴阳……《礼说》曰: 禹耳三漏, 是谓大通, 兴利除害, 决河疏江。皋陶马喙, 是谓至诚, 决狱明白, 察于人情……孔子反宇, 是谓尼甫, 德泽所兴, 藏元通流。”^{[3](337-340)}

从宿命论角度观察, 相术强调命运的必然在人身自身的形貌。人的相貌千差万别, 命运也各不相同, 除一般的吉凶、祸福、寿夭之外, 还涉及婚姻、仕宦、子女等方方面面的事情。人在社会上的遭际也是很复杂的, 人的命运也因此呈现动态性, 可能先吉后凶、先凶后吉, 也可能先后吉中间凶, 先后凶中间吉或凶中有吉、吉中有凶。凡此种种, 相者都得考虑, 因此要对难以解释甚至根本无法解释的所谓命运作出合理诠释, 且要符合每个具体的人的命运, 不仅要求相术家熟悉相术理论, 还要求他们有丰富的社会阅历(有时还要对被相对象作暗中调查)和临场随机应变的能力, 善于审时度势, 大胆作出预测(他们暗中根据被相者的现状所作之分析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史传和志怪小说中所记载的相术家往往都是当时有影响的学者, 就是这个原因。

宋前各种史籍都有关于相术故事的记载, 而以志怪小说为多。志怪小说如《搜神记》、《神仙传》、《异苑》、《独异志》、《定命录》、《广异记》、《玄怪录》、《续玄怪录》、《稽神录》、《墉城集仙录》等都载有这类故事。通过这些小说, 我们可略知宋前相术操作的大致

情况。这里不拟全面展开，只是以《定命录》所记袁天纲相命的故事作简要钩稽和解说^①。

《定命录》所载袁天纲事为《太平广记》卷二二一所收录，《旧唐书·方术传》本于此小说而记事顺序有所调整^{[4](174)}。从这篇小说看，袁氏不仅有一套相面的术语，而且相法动态、变化多端。例如他在隋大业初相窦轨，说窦氏“君额上伏犀贯玉枕，辅角又成就。从今十年后必富贵，为圣朝良佐。右辅角起，兼复明净，当于梁益二州分野，大振功名”。伏犀指前额至发际的骨骼隆起，玉枕为后脑穴位名，辅角即下巴，分为左右两辅。可见此相面术语言已非常“专业”。后窦氏担任了益州行台仆射，请袁天纲再相之，天纲说他“骨法成就，不异往时，然目色赤贯童子，语浮面赤。为将多杀人，愿深自诫”。窦氏为武将，又“目色赤贯童(瞳)子”，为凶残之表征，故天纲以少杀为诫，可见他是因人而相。武德九年，窦轨被征诣京，问袁天纲将得何官，袁氏说他“面上家人坐位不动，辅角右畔光泽，更有喜色。至京必蒙圣恩，还来此任”。后来窦氏果然当上了益州刺史。袁氏固是神相，但从大业初(公元605年~618年)到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中间相隔达二十年，袁氏毫无疑问有充足的时间对窦氏加以观察。其中所隐含的潜在情况，小说家并未说明(可能也不清楚)，看上去袁天纲便真是神乎其神了。《旧唐书·方伎传》说“袁天纲前知武后，恐非格言”，《新唐书·方伎传》说“凡推步、卜、相、医、巧，皆技也。……小人能之，则迂而入诸拘碍，泥而弗通大方，矜以夸众，神以诬人，故前圣不以为教，盖吝之也”，都从史家或儒家理性角度对相术一类方技持保留、批评态度。因此之故，新旧《唐书》窦轨本传皆不记其遇袁天纲事，以示对相术的保留态度。

志怪小说所记相术给人的震撼力量并不在相术本身的神秘，而在于人们所遭遇的事情的不可思议。在现实生活中，来自自然、社会与人本身的各种复杂因素往往使人对自己的命运难以把握、对前途难以预测，人们把它归之于命。所谓命，实是“客观存在物之内在与偶然性之总和，是说不出原因的结果”。^{[5](276)}志怪小说叙述相术故事的目的之一是宣扬命定论，故事中所透漏出来的冥冥之中不可改变之设定，读之令人嗟叹、感喟。例如《搜神记》卷十九“陈仲举”条：

陈仲举微时，常宿黄申家。申妇方产，有扣申门者，家人咸不知。久久，方闻屋里有人言：“宾堂下有人，不可进。”扣门者相告曰：“今当从后门往。”其人便往。有顷，还。留者问之：“是何等？名为何？当与几岁？”往者曰：“男也，名为‘奴’。当与十五岁。”“后应以何死？”答曰：“应以兵死。”仲举告其家曰：“吾能

相。此儿当以兵死。”父母惊之，寸刃不使得执也。至年十五，有置凿于梁上者，其末出，奴以为木也，自下钩之，凿从梁落，陷脑而死。后仲举为豫章太守，故遣吏往饷之申家，并问奴所在。其家以此具告。仲举闻之，叹曰：“此谓命也。”

民间有“躲脱不是祸，是祸躲不脱”之说，就是从这类故事中总结出来的。陈仲举假借相术告诉黄申其子将来要被兵器杀死，可能连他自己都不深信(不然他当了豫章太守后就不会派人去黄家问小孩的情况)。黄氏引以为诫，对孩子百般防护，可小孩还是因偶然事件丧生。这种充满神秘感的命运故事，读来令人痛心、扼腕，陈仲举将之归于“命”，似也有理。

又如《太平广记》卷二一六所录《定命录》记李蒙事。有个叫车三的相者当着李蒙的面预言他有官无禄。“众皆不信，及至京，果注华阴县尉。授官，相贺于曲江舟上宴会。诸公令蒙作序，日晚序成。史翊先起，于蒙手取序看。裴士南等十余人，又争起看序。其船偏，遂覆没。李蒙、士南等并被没溺而死”，李蒙已高中进士，却在曲江宴会时因争看他所作之序翻船溺死，以这样的结局来应验车三的预言，实在令人叹惋。细想起来，乐极生悲的事情世间确实不少，个中原因要解释也可以解释，但总难解释清楚，相者归之于“命”，人们也只好相信。

有时相者所云往往有深意存焉，如《太平广记》卷二二二所录《命定录》“裴光庭”条：

姚元崇，开元初为中书令。有善相者来见，元崇令密于朝堂，目诸官后当为宰辅者。见裴光庭白之。时光庭为武官，姚公命至宅与语，复使相者于堂中垂帘重审焉。光庭既去，相者曰：“定矣。”姚公曰：“宰相者，所以佐天成化，非其人莫可居之。向者与裴君言，非应务之士，词学又寡，宁有其禄乎？”相者曰：“公之所云者才也，仆之所述者命也。才与命固不同焉。”姚默然不信。后裴公果为宰相数年，及在庙堂，亦称名相。

封建时代官场充满变数，“非应务之士，词学又寡”的裴光庭竟不按当时取人常规做上了宰相，实不足怪。相者归之于“才与命不同”，多少道出了其中奥秘，颇能发人深思。

我国周代以来即有“皇天无亲，惟德是辅”^{[6](309)}、“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古训^{[7](306)}，形成了重人事轻天命的哲学理念，儒家尤其如此。荀子作《非相》，提出“故相形不如论心”的观点，否定相术而肯定个人的心术修为，就是对这些古训的继承和弘扬。儒者王充虽相信骨相，也曾提出相有两种：“非徒富贵贫贱有骨体也，而操行清浊亦有法理。贵贱贫富，命也。操行

清浊，性也。非徒命有骨法，性亦有骨法。唯知命有明相，莫知性有骨法，此见命之表证，不见性之符验也。”所谓性之骨法，即指人的德行品性。后世相者多接受了这一理论，认为决定人命运的东西不仅在骨相，更取决于个人的德行品性，甚至强调个体德行、修为具有改变命运的力量：“善相者，所以为先察其德。然后相其形。故德美形恶，无妨为君子。形善行恶，不免为小人……是知德在形先，形居德后也。郭林宗观人有九德：一曰容物之德，二曰乐善之德，三曰好施之德，四曰进人之德，五曰保常之德，六曰不妄之德，七曰勤身之德，八曰爱物之德，九曰自谦之德。”^{[8](335)}

志怪小说中讲德行改变命运的故事比比皆是，大多同上面谈到的儒家重德行的命相理念有关。例如戴祚《甄异传》载张闾卸下车上所载之物而装载病人得以改命一事^{[9](2546-2547)}。此病人是鬼，奉命来捉拿张闾。看到张闾的长相，不忍心取其命，于是佯装病人来试探其德行。张氏的德行感动了他，他竟然违反阴曹法规去找一个同名入代替张闾。张闾形美，德亦美，得到的回报是“年六十，位至光禄大夫”。《搜神记》异本《稗海》本卷之五记载赵明甫因行善而改相的事^{[10](98-99)}，更有奇趣。赵氏素晓三命，能自知官禄寿，官不过邑长，寿不过六十，相者所相亦如其言。赵氏五十四岁时，逢人便说他最牵挂的事情就是女儿还没找到合适的人婚配，不得已先为她找一个仆使来照顾以防不测。事有凑巧，他所找仆使是因战乱而流落至此的亲戚之女，此亲戚已经亡故。赵氏同妻子商量，把为自己女儿准备的妆奁送给仆使，先把仆使嫁出去，而自己女儿却没嫁。这一善行改变了他的凶相，相者再次见到他时大骇，曰：“昨观君容，其命将殂，今日观之，福禄与寿，未可言也。”当得知他嫁仆使一时，贺令曰：“此禄寿长，未可测也。”赵明甫先嫁仆使的德行得到了阴报，增延寿禄，“后人观此，胡不动心”。这类故事，显然有劝善的功用。

因德行有亏恶而被减禄减寿的故事也不少。《广异记》载苏颋年少时^{[11](34)}，有相者云：“当至尚书，位终二品。”而苏氏却官至尚书三品便病亟。原因是苏氏在作桂府时杀了两个人，因而被减官一品，减寿二年。这是结局受报应。还有立马就受报应的。例如《广异记》又载李晷见来访的妇人“容貌风流，言语学识，为时第一”^{[11](70)}，不敢接受，送给太常卿姜皎。姜皎欣然接受，大宴公卿。此女深明相术，宴会上，她相了一群人，别人都为吉唯独姜皎为凶：“君虽有相，然不得寿终。”果然，酒阑人散之后，姜皎与妇人亲昵，公卿窥睹，只见床下有白骨，姜皎已被妇人(鬼魅)吃掉，可见德行有亏会导致立马折寿。

道、释两家也讲骨相，不过角度稍有不同。道教认为命相有亏，可通过修道来解决。如《神仙传》卷五载，太玄女颛和少丧夫主，有相者相其母子曰：“皆不寿也。”太玄女母子乃学道，治玉子之术，遂能入水不濡。又能行三十六术，甚有神效，起死无数，后忽白日升天而去。这是用仙术来解决命相太短的问题。修仙也需要修德，德行不正，即使有好的命相也会折寿。《宣室志》载郑又玄相中本来有“道气”，但品性骄傲，羞辱过邻舍同门寒士闾丘氏，导致闾丘氏忧病而死。后又在宴会上怒骂同舍仇生，使仇生羞辱而死。郑又玄虽好黄老之术，但最终不仅未得仙诀，反而被仙童说破惭恚而死。所以道教对相术的理解也有同儒家相通之处。

佛教之放生、念善、持斋、奉戒等行善理念对相术也有影响。例如《宣验记》所记郑鲜因行善而延命的事^{[9](1168)}。作品开头就说郑鲜“善相法，自知命短”，梦见沙门给予指点“六斋日放生念善，持斋奉戒”。郑鲜照办而得以延年，体现了佛教德行对命相术的重要作用。又如王琰《冥祥记》记载齐僧钦信佛持斋精苦，按命相只能活十八岁，十七岁时病笃甚危，有女巫为他设探命之术，病情缓解，遂更加精勤，竟至增寿二十四年。

总之，在宋前志怪小说里，相术不仅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观念，更宣扬相德、相心先于相形的理念，这样便大大强化了作品的文化内涵，使之更有价值。

二、宋前志怪小说相术叙事的特色

志怪小说中的相术叙事有自身的模式。

中国古代一般小说都深受史传的影响，相术类志怪小说尤其如此。由于相术所记多是有影响的名人，作者叙事之意又多为史家提供相术应验之案例，因而有时即使写一个小片段，也要交代被相者的姓名、籍贯、职务等，以加强其真实性，给人以凿凿有据的感觉。实际上，志怪小说中的名人被相故事也确有不少为史家所采择，例如《异苑》卷四所记相者师圭相陶侃，说陶氏左手中指有竖理，若彻于上，即位在三极一事，就被《晋书·陶侃传》所采纳；《命定录》言袁天纲相命事，《卖馊媪》所记马周之妻有事，都为新旧《唐书》所采纳，如此等等。

由于相术讲究应验，因而先对某一人物之命运作出预言，然后以其结局加以照应是其基本的叙事模式，一些叙事比较简单的篇章尤其如此。但因为相术往往

涉及被相者的形象或德行，因而少不了要对被相者施以与命运有关联的身体部位或相关情节之描写，这样就增加了作品的形象性，能给读者留下较深的印象。例如《朝野僉载》所记裴氏妾事：

周郎中裴珪妾赵氏，有美色，曾就张璟藏卜年命。藏曰：“夫人目长而漫视。准相书，猪视者淫。妇人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终以奸废，宜慎之。”赵笑而去。后果与人奸，没入掖庭。

作品一开篇便直指赵氏，然后引出相者的预言，最后两句交待结局以印证预言，既无过程也无细节，但由于插入了有关赵氏的形象描写，尽管只有寥寥数笔，读来仍不失生动。《幽明录》记晋孝武帝母后李氏事虽简，情节也颇动人：

晋孝武帝母李太后，本贱人，简文无子，曾遍令善相者相宫人，李太后给皂役，不豫。为相者指之：“此当生贵子，而有虎厄。”帝因幸之，生孝武。及会稽王道子既登尊位，服相者之验，而怪有虎害，且生所未见。乃令人画作虎象以厌之，因以手抚欲打虎戏，便患手肿痛，遂以疾崩。

相者称李后当生贵子而有虎厄，生了孝武帝，司马道子服其应验，却想避开虎患，于是令人画虎象以镇邪，不想李氏做了个用手抚摸虎象欲打之的游戏动作，便得了手肿病，不治而崩。司马道子想给李后免灾反而导致李后应验了相者预言，这样的情节出人意料，也引人惊诧，使作品不仅生动，且余味无穷。

出自《嘉话录》的《薛邕》篇中^{[9](1088)}，张山人所相薛邕、崔造、姜公辅三人，自认为越有希望者，相命所说越不如意。其中姜公辅最好，而当时他的地位最低，后来的结果皆如相命所言。小说描绘有希望者势在必得之心理，来反衬命运的客观性。薛邕有宰相望，问相者坐中有宰相者几人，说两人时，以为一人必为己，而相者所言却是崔姜二人，他惊讶忿怒，默然不悦。在崔姜二人分高下时，而崔郎心想我已经是正郎，姜公辅，肯定自己在前，相者所言却说他在姜后。在被相群体人物心理落差的描绘中说明命运的客观存在，不因被相者的地位而改变，来应验相者之言，余味曲包。

志怪小说中也有摆脱一般宣扬相术神验和前因后果相互呼应的叙事方式，由宣扬相术转而褒赞美德、塑造人物的作品。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拾遗记》所记甘后：

先主甘后，沛人也，生于贱微，里中相者云：“此女后贵，位极宫掖。”及后长而体貌特异，至十八，玉质柔肌，态媚容冶。先主召入绡帐中，于户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献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侧，

昼则讲说军谋，夕则拥后而玩玉人。常称玉之所贵，德比君子，况为人形而不可玩乎。后与玉人洁白齐润，观者殆相乱惑。嬖宠者非惟嫉于甘后，亦妒于玉人也。后常欲琢毁坏之，乃诫先主曰：“昔子罕不以玉为宝，《春秋》美之。今吴、魏未灭，安以妖玩继怀。凡淫惑生疑，勿复进焉。”先主乃撤玉人像，嬖者皆退。当斯之时，君子议以甘后为神智妇人焉。

甘后是刘备的皇后，她微贱时即被相者预言将来会位极宫掖。后来果然被刘备宠幸。作者不是把重点放在相术的应验方面，而是以极雅洁的笔墨来描写她的姿容体态，以河南所献玉人来烘托她，以观者乱惑、嬖宠忌妒来反衬她，以刘备的极其爱幸来凸现她，使她的外在形象穷妍极态、完美无瑕。最后用她的毁玉、劝诫刘备来彰显她识见的高远、品性的贞正与心灵的纯洁，把外在美与内在美高度统一起来，巧妙地塑造出了她“神智妇人”的形象。这则故事在相术叙事中堪称精品。

志怪小说的相术作为一种重要叙事元素，往往有引起事由、设置悬念、铺展情节、描写人物、严密结构、深化主旨、引人入胜等多重作用。

王琰《冥祥记》记载宋齐僧钦敬斋戒精苦而战胜病魔增加二十四年寿命之事，相命四次出现在文中。第一次是开头说明他命的期限，危在旦夕，领起下文。第二次是在巫婆为他治病的时候，说明他福力猛盛，应该有善神护卫，说明有治好的可能性。第三次在巫婆求神护卫时，求得两算，说明还可以活二十四年，说明治好病成为必然。第四次是最终结果是如第三次所言。四次出现了有关相命的术语，对应着小说的起、承、转、合，与宋齐僧钦敬之命从危转安到确定为安紧密相连。

《汤氏子》中其相命判语“少年有五品相，必当不死，若死，吾不相人矣”穿插在小说的中间^{[11](127)}，既是对其汤氏子为父还击陇西望族李氏多次猥辱的褒奖，又是领起后面情节的纽带。施行后气绝至夕乃苏。狱卒以绳缢之其夕三更复苏。卒又缢之及明复苏。刺史呼其父令自毙之，对众缢绝收尸回家又复活。因葬空棺，养之暗室，久之无恙。乾元中，为全椒令卒。正应中了“五品相”之判语。

相术叙事的作用在不少长篇表现得更加明显。例如李复言《续玄怪录》中的《郑虢州驸夫人》中被相者是弘农令准女婿卢氏之禄命^{[12](127)}。巫婆(相者)认为子婿中形且无髯，从根本上否定了有髯的卢氏为子婿。弘农令之妻认为婚礼就在晚上进行，女婿非卢氏莫属。孰是孰非成了小说的聚焦点。一切客观形势似乎都证明相者之语为无稽之谈，判语就在今夕见分晓，在紧

凑的时间上,作者紧锣密鼓地生发情节也意在证明这一点。卢氏来纳彩说明婚事在望,巫婆仍坚持己见,被弘农令一家人驱逐出去;晚上卢氏来迎亲,“乘轩车来,展亲迎之礼,宾主礼具,解珮约花”,巫婆之言眼看就成泡影。突然“卢氏若惊奔而出,乘马而遁,众人追之不及”,卢氏在婚礼仪式上无缘无故地逃遁,小说的情节陡转开始偏向相者之言。掌人看不过,当即证实女子之美,并出策能出聘者当即成亲,郑駒即卢氏的候相出面,婚礼还是在今夕举行,新郎成了郑駒,巫婆之言在事出突然的婚变中应验了。小说情节由相命而起,又因相命而横生波折,最后又由卢氏见到郑駒时说出当年惊走的原因来强化相命所暗含的哲理——“结褵之亲,命固前定,不可苟求”——来深化作品的主题。

《裴谡》中裴谡在与二迁客武彻、于仲卿话旧时^{[13](2-3)},有以前的相者之子来访,倒叙有关相者安禹对他和其他人命运的预测,以此来安慰贬官到此的二迁客。相者对裴谡所托之事说在他到郡三日相者之子会来此郡做官,因为此子命薄,所许官应在十千以下,而来访之人正是相者之子,时间和地点都如相者所言。相术预言的出现,有千呼万唤始出来之感。裴谡因为与二迁客话旧,在官吏有报“寄客前巢县主簿房观请谒”时不想接待,约改日来访。房观说与裴谡有旧,非得在今日谒见。裴谡有点莫名其妙,其亲朋戚友没有姓房的,让其上呈父祖官讳,房观应对自如,并于怀中探一纸旧书要托付官吏交给裴谡。裴谡见到旧书后,作者并没有马上交代其始末。随之而来的是裴谡览之愀然的神情之变、易素服请房观一同去堂下东边的屋子里凭吊亡灵的异举、未脱丧服就向旁边人打听俸禄为七八千的空缺职位信息的非礼之行,二客惊异于裴谡见旧书后表情和行动的骤然变化,显然其来访之人意义非同小可。在裴谡在空缺职位上写上房观之名后,他才交代事情之原委,和盘托出相命一事以及相命中包含事事皆命中注定的哲理来安慰二迁客,与二迁客话旧对接。接下来的情节,相者所言人的命运皆如预言所言,又形成了前后照应的结构模式,使小说的结构更加紧密。

出自《河东记》的《韦丹》^{[9](827-829)},其相命的出现蕴含着佛教的放生观念。韦丹在路途中碰到一正在出售的鼋,他用所乘马来换其鼋,然后放生。在韦丹去相命时,相者胡芦先生倒屣迎门,但他却说只有他师父元长史知道韦丹的福寿,于是领他去见元长史。当他见到元长史的时候,这一须眉皓然的长者却向韦尽礼先拜,韦丹受宠若惊,元长史说出尽礼之由,是因为他救了他的性命。韦丹此时才知道面前的长者就

所救得的鼋,但没有明说其意。元长史具备珍馐来招待他,在天黑韦丹辞别老人之际,老人才告知其禄命。于怀中出一通文字,授韦曰:“知君要问命,故辄于天曹,录得一生官禄行止所在,聊以为报,凡有无,皆君之命也,所贵先知耳。”所授文书就是韦丹的禄命。相命经辗转才出,就是为了顺应开头韦丹放生的善举而巧妙安排的。

又如《广异记》所记郇澄事。小说先写京兆武功人郇澄因应试到达东都洛阳,骑驴行槐树下,见一老妇,说自己善相,主动要求为郇澄看手相。郇澄开头很是厌恶,老妇再三相劝,郇澄只好骑在驴上把手伸给她。这样开头,看似全不经意,却引出了令郇澄惊骇之事:“母看毕,谓澄曰:‘君安所居,道里远近宜速还家,不出十日,必死。’”这无疑给读者留下了强烈的悬念。接着写郇澄求老妇解救之法,老妇要求他施食粮狱,郇澄照办后回见老妇,老妇要他速归,事情至此好像已经解决,郇澄到了武功并无疾病,颇感庆幸。读者似乎也松了一口气,认为故事到此已届结束。可下面竟又生出许多波澜:先是有十余人拜迎道左,自称神山百姓,听说郇已被选为县令,故来迎候。郇氏连考试都未参加,却当了县令,出人意表,悬念自然再度而起。走了不远,又有策马来者,有持绿衫来者,郇氏不得已,随之而去。行之十里,又有碧衫吏下马趋郇氏而拜,自称慈州博士,说郇氏已升任长史,特来远迎。片刻之间郇氏便不断升职,虽足以令人生疑,却也足以令人惊喜。一直走过二十多里,博士才露出真相,说郇氏已成新鬼,自己是奉命前来捉拿他的。原来前面的一切都是陷阱!故事至此可谓一波三折,令人悲喜交加,但仍然不是结局。接下来郇氏被赶到一甲第:

门榜云:“中丞理冤屈院。”澄乃大叫冤屈,中丞遣问:“有何屈?”答云:“澄算未尽,又不奉符,枉被鬼拘录。”中丞问:“有状否?”澄曰:“仓卒被拘,实未有状。”中丞与澄纸,令作状,状后判检。旁有一人,将检入内。中丞后举一手,求五百千,澄遥许之。检云:“枉被追录,算实未尽。”中丞判放,又令检人领过大夫通判。至厅,见一佛廋小胡,头冠毡帽,著麋靴,在厅上打叶钱。令通云:“中丞亲人,令放却还生。”胡儿持按入,大夫依判,遂出。复至王所,通判守门者,就澄求钱,领人大怒曰:“此是中丞亲眷,小鬼何敢求钱?”还报中丞,中丞令送出外。

原来中丞、通判、小鬼沆瀣一气集体作弊,连阴曹地府也要贿赂才能脱身!下文写郇氏倘没有遇上已故的妹夫,还有变成闲鬼,三五百年都不得变转的危险。这一由相术引起的故事,显然已不限于相术本身

的因果关系，而是由此引出于人间官场的曲讽，深化了作品的主题。

三、结语

术数作为一种文化已经远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〇九《子部十九·术数类二·命书相书之属》著录数种，仅仅是“择其稍古与稍近理者，录存数家，以见梗概”，已经不屑一顾。相术作为术数文化的一种也是如此。但它曾经作为一种波及朝野上下的思想，对志怪小说的文化意蕴和叙事所产生的影响，功不可灭。尤其是它作为一种叙事元素，为小说叙事学的研究，能提供充分的素材。

注释：

① 据日本学者内山知也研究，《定命录》原名《定命论》，为赵自勤作，《新唐书·艺文志·小说类》有《定命论》十卷，吕道生《定命录》二卷，并注明是“太和中道生增赵自勤之说”。《宋史·艺文志·小说类》录赵自勤《定命录》二卷，而无道生之作。可能其时道生之增补已合并入赵自勤之作当中，并改“论”为“录”。赵自勤天宝至乾元间曾任左拾遗、括州刺史、秘书监及苏杭一带地方官等职。

今《太平广记》所录《定命录》共 62 则，其中 59 则为赵自勤所作，3 则为吕道生所作。详《隋唐小说研究》第三章《盛唐小说论》第四节赵自勤与《定命录》，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年出版，第 167-176 页。

参考文献：

- [1] 宋会群. 中国术数文化史[M].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9.
- [2] 何文典撰. 淮南子集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 [3] [清]陈立撰、吴则虞点校. 白虎通疏证[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 [4] 内山知也. 隋唐小说研究[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 [5] 李生龙. 无为论[M].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 [6]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7] 朱谦之. 老子校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8] 谢路军主编、郑同点校. 四库全书全书初集二·玉管照神局卷中[M]. 北京: 华龄出版社, 2006.
- [9] 李昉等编. 太平广记·卷 321[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 [10] 陶潜撰, 汪绍楹校注. 搜神后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11] 戴孚. 广异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12] 李复言. 续玄怪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13] 钟铨. 前定录. 丛书集成初编[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Cultural Implications an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Physiognomy Narrative of Mysterious Novels Before Song Dynasty

ZHANG Bib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Physiognomy promotes ideological determinism while stressing the importance of morality and soul, which contains the culture of the mysterious novelists' pursuing. The writers concerned promote determinism including the life and death as well as wealth and stress the concept of morality and soul compared to physiognomy in the novel through the physiognomy narrative in order to strengthen 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work, which are closely linked with 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physiognomy. It is the basic mode of narrative that shows the ending works in concert with the physiognomy predictions of the fate of the characters. Associated with the fate of the body part or the description of the relevant plot, the physiognomy leads to the unexpected plot of stories and the praisal of virtue to shape the character, which increases the image and vividness of work. Physiognomy has played the role of introducing the subject of narrative, arranging suspenses, developing plot, describing characters, tightening structure, deepening the idea and attracting readers and so on.

Key Words: physiognomy; mysterious novels; physiognomy narrative; cultural implications;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编辑：胡兴华]